

先活下来,再谈独立性和影响力

一个民间智库的“低调”生存之道

本报深度记者 刘德峰

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(下简称“长城所”)对很多人来说,并不是一个熟悉的角色。相较于天则经济研究所,它更不会在公共舆论场中引起话题。

然而提到“中国制造”、中关村“二次创业”或环青海湖自行车赛,在这些项目背后出谋划策的这个民间智库便很难再被忽视。

作为三名创办人之一的长城所所长王德禄,对民间智库独立性的追求,贯穿于创办至今。他期望的是,智库通过发表的报告影响政府决策,进而影响社会发展。而智库的影响力,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独立性。

在与中国经济发展同步的20年时间里,“低调”一直是王德禄遵守的一个原则。只有在市场上生存下来,才有基础谈民间智库的独立性和影响力。



▲李锐为王德禄题写的“民间智库”。受访者提供



由国经中心举办的第三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举行。刘德峰 摄

影响力取决于独立性

“知识分子往何处去是当时我们考虑最多的问题。”6月7日,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东配楼二楼,谈及当时“下海”创办长城所,王德禄这样告诉齐鲁晚报记者,“要让知识分子在市场化大潮中独立地、有尊严地、体面地生存。”

1993年8月26日,怀着共同抱负的王德禄、刘志光和武文生三人创办长城所。三个均非经济学专业出身的“中国合伙人”,开始寻找他们在市场经济时代的位置和价值。

创办长城所之前,学物理出身的王德禄曾在社科院《自然辩证法通讯》杂志工作。“当时这份杂志被称为改革开放的四大窗口之一。”王德禄说,工作期间与专家学者的交流,对当时经济发展出现的新问题、新领域和新方法的思考,以及与当时已经“下海”的柳传志等人的接触,都让他与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和高科技产业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长城所从一开始就以“双

立人格受到了打压。”这恰恰是他无法接受的。

这种追求延续到了长城所身上。

为了保证经济上的独立性,1993至1994年间,长城所与希望集团、四通集团等企业进行咨询合作;1995至1996年间,又与湖北劲酒、联想集团、北大方正和清华紫光等企业展开咨询合作。时至今日,长城所仅咨询业务每年就可收入上千万元。

相比于咨询公司,王德禄把长城所更多地看做一个智库。智库和咨询公司最大的不同在于,智库通过发表的报告影响政府决策,进而影响社会发展。“王德禄说,而智库的影响力,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独立性。

“和政府部门没有隶属关系的智库更有独立性,研发水平越高的智库越有独立性。”王德禄说,高水平的民间智库对政府的决策更有价值,“因为它们的声音来自民间、来自市场,这才是政府决策真正要考虑的问题。”

为政府出谋划策

“你们这个思路很好。”1995年5月13日,时任北京市副市长胡昭广,听到武文生和王德禄提及把风险投资模式引入中关村企业建设,对这个想法表示肯定。

长城所与北京市政府的接触,源于1994年年底的第二届软科学技术大会。此前,一心追求独立性的王德禄并不愿意与政府直接接触,“本来以为下海后就和政府脱离关系了。”

会后,时任北京市科委软科学处处长李琬找到长城所交流。在交流过程中,王德禄表示出了对中关村二次创业的兴趣。此后,北京市科委软科学处委托长城所和中关村试验区办公室,共同进行关于二次创业的研究。

“这是我下海后第一次承担政府的软科学课题,也是政府第一次将软科学课题委托给民营企业。”王德禄说,在后来的合作过程中,他也渐渐认识到,“政府项目也是我们的市场。”

此后,长城所与中关村的互

动越来越多。

1998年4月,当时新任海淀区区委书记的朱善璐,读完长城所企业研究报告《知识经济与中关村》后,立即致电长城所,对这份报告的观点表示认可,并认为这份报告对其开展工作有很大帮助。朱善璐希望与长城所保持密切合作。

知识经济、高技术产业和新经济一直是长城所关注的话题。长城所围绕中关村建设与官方的合作,一直保持至今。而在其中,长城所为政府提供的政策性建议,又吸引包括武汉、深圳和宁波等多个城市高新区向其伸出橄榄枝。

“我们自成立以来,每月刊发一期的企业研究报告,是包括吴敬琏在内的很多学者较为重视的参考材料。”王德禄颇感自豪。

长城所国际业务部咨询师佟大伟告诉齐鲁晚报记者,2002年9月,长城所发布国内第一份关于“中国制造”的综合性研究报告《科技创新与中国制造》,公布了80个位居世界第一个的“中国制造”品名单。“虽然在我们之前,‘中国制造’一词就开始出现,但我们的研究,对‘中国制造’的内涵做了最为全面的阐释。”王德禄告诉齐鲁晚报记者。

2009年7月2日,首届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召开,目的在于研究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之策。据王德禄回忆,会上他接受众多媒体采访,“在参会的民间智库代表中,我们影响力很大。”王德禄高兴地说。王德禄会后在博客中提到,“在金融危机复苏的趋势下,中国需要一批民间智库崛起,共同研究应对之策。”

出于无奈的低调

“我们自成立以来很明确的一点,就是低调发展。”同样成立于1993年,长城所与茅于軾所带领的天则经济研究所风格迥异。

风格上的差异,也让这两个民间智库经历了不同的命运。据媒体报道,在2003年前后,天则经济研究所曾因内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,几乎威胁到自身的生存。据王德禄介绍,长城所发展

得一直比较顺利,并没有遇到如天则一样的困难。

“之所以这么顺利,最重要的一点就是,我们学会了如何在市场上生存。”王德禄所说的生存方式就是:低调。

这份低调,实际上也是出于无奈,这基于长城所三位创始人对最现实问题的考虑。“总和政府部门站在对立面,政府部门不愿给项目,企业不敢给项目,就养不了这么多人。”王德禄告诉齐鲁晚报记者,只有在市场上生存下来,才有基础谈民间智库的独立性和影响力。

在这一理念的影响之下,长城所长期关注那些能够更好地促进社会进步的课题研究,比如高新区建设和推动创业。据佟大伟介绍,与其他民间智库相比,长城所更加务实,强调做好每一个咨询项目。“我们所做的研究成果,即使得到了客户的广泛推广和认可,也不会大肆宣传,所谓做十分讲三分。”佟大伟说。

即便如此,王德禄心中也清楚,同样作为民间智库,国外的同行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,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通过公共舆论实现的。他也希望民间智库的声音,能在当下的公共舆论场中越来越响亮。

“要让长城所发出的声音和长城所的实力相匹配。”近年来社会对民间智库的关注与讨论,更增强了王德禄的信心。

实际上,低调的不只是长城所。据王德禄介绍,英国智库成员马克·伦纳德曾拜访中国社科院,当他获知社科院有50个研究所,260个研究学科,4000名全职人员时很吃惊:为什么这么多人在为政府决策做研究,他们的研究方法却并不为人知。

“对中国智库来说,亟需改进的还是影响力。”在王德禄看来,长城所已经在与地方政府的互动中积累了不小的影响力。“过去的20年我们在总结,做出了不少事情,多与新经济有关。未来20年,我们要继续成长。”

想实现这一目标,需要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,以及政府对民间智库更多的重视和支持。

(上接B01版)

期待“松绑”

“官方智库由政府部门主导,他们在研究方面不会从全社会角度出发,而多代表部门利益,民间智库恰恰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陷。”谈到民间智库作用时,邓聿文说。

温家宝在2013年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中提到,要“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,深入推进改革开放”。在邓聿文看来,这里的“智慧”便是来自全社会的智慧。

“这些智慧要通过智库来表达,最广泛的途径就是民间智

库。”邓聿文说,民间智库可以在如今这个多元化社会中发出多元化声音,这将有利于政府在制定政策时,考虑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,以保证政策的客观性。

毕研韬认为,在战略传播方面,国外正通过其非政府机构发出声音,而我国往往以官方机构去做沟通和应对,这也构成了一定程度的不对等以及沟通上的障碍。“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我民间力量的壮大,特别是民间智库等机构的壮大。”

近日,一份由国经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“国外智

库管理体系研究”课题组完成的报告刚刚解密。

有媒体指出,这份题为《新时期加快我国政策咨询类智库建设的建议》的报告,经高层批示,或将对我国智库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。

国经中心相关课题组认为,要使民间智库能够真正在未来的政府决策中充分发挥作用,应该在民间智库的资金来源方面,通过减少限制鼓励智库多元发展。如为民间智库投资人实行减免税政策,将符合条件的智库按非营利法人看待,允许民间智库

以非政府组织的身份接受捐赠。同时,建议各级党政组织在重要问题研究和起草政策方案时,吸收智库参与,必要时允许两家或多家智库共同参与。

邓聿文告诉齐鲁晚报记者,民间智库要真正成熟,也需要政府给予他们更加自由、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发展空间,“政府部门要听得进非恶意的批评。”

“美国联邦政府专门设置一个国家科学基金会,每年拨付十几亿美元的资金,其中大多数用于资助各个智库。比较而言,中国对智库的支持力度还显得不

够。”王德禄说,只有改革更加深入,官方更加重视,民间智库才能发展得更好。

王德禄对民间智库未来的发展十分乐观。王德禄说,与20世纪90年代前后第一批民间智库成立时不同,现如今以市场为主题的人力资源配置的建立,使研究人员更愿意到民间智库工作,这使得民间智库的发展空间更大。随着改革的持续深入,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更多,也更细致。这给在不同领域有所专长的民间智库机会,让他们能拿到更多的项目,获得更大的发展。